

略论中国现代“新目录学”的基本流派

陈传夫(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解体。西方文化输入到了中国。在中国文化史上,“五四”运动前八十年,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新学与旧学的斗争。学术上出现了中外合流的倾向。在目录学史上,也是书目工作实践和学术史,内容出现变更的时期。学者认为,“近现代目录学史的发展是一部新与旧的交替,进步与落后斗争的历史,也是封建主义目录学衰亡,……同时也是西方目录学的传入,影响我国目录学发展的时期……应当作为我们研究的着重点。”〔1〕1919年以后,书目工作出现了许多系统,有宣传介绍马列主义学说的书目,如冰冰的《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有配合文学科学研究的专题书目和个人著述目录,如阿英《松沪战争戏剧初录》,邵子风的《甲骨文书录解题》、吕绍虞的《中国教育书目汇编》、柳倩的《郭沫若先生二十五周年著译编目》;有地方文献目录,如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有新书总目,如平心的《〈生活〉全国总书目》;有古籍书目、索引,如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书目提要》等等。不同系统的书目为不同风格的目录学流派的产生创造了客观条件。

从图书馆事业史的角度看,本世纪初正是封建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过渡的时期,即从其职能看为“第一代图书馆”向“第二代图书馆”过渡的时期。〔2〕康、梁变法,为启民智,广设书局与公共藏书楼。清末各省立公共图书馆纷纷设立,“到民国三年左右,除少数边远地区,全国大部分已建立了省级公共图书馆”。〔3〕经过“新图书馆运动”,至1936年全国有公共图书馆5196所,为旧中国图书馆事业之巅峰。图书馆职能的演变,使图书馆“经营术”尤为重要,而“分类编目”变成了连接“人”与书的“介绍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向古典目录学提出了挑战,适应这一挑战的“新目录学”便应运而生。

近现代,由于“国学”的倡导,古典目录学在这时也进行了系统总结,形成了古典目录学的不同流派,如目录家之目录学、版本目录学、校雠目录学、文史目录学等等,“新目录学”与古典目录学并存、互竞,是这时期目录学的特点。对于古典目录学的流派,我曾在专文中论述过(见拙作《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基本流派及其理论成就》,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85年第5期,后由人大复印资料《图书馆学、情报学与资料工作》1986年2期转载)。我们也注意到,目录学界对古典目录学论述多,而对“新目录学”却忽视了。有鉴于此,本文将补论后者。

据笔者所知,“新目录学”之成词,最早见于王云五先生1943年所著《新目录学一角》一书。后又见黎锦熙先生《新目录学及“类码法”之扩大应用》和《新目录学论丛》一书。这里我们借用“新目录学”一词泛指这一时期目录学的新流派。这派目录学的特点是反传统目录学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学,主张目录学为“方便稽检”的“簿计之学”。如果说传统的古典目录学为理性主义的话,“新目录学”则为实用主义之学。客观地总结新目录学的派别与成就,对于从实质上探索中国目录学史上的特殊时期—现代目录史(1919—1949)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新目录学的流派,我们分观如下。

一、中国传统目录学与西洋图书馆技术相结合，形成“图书编目学”一派

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刘国钧、杜定友、沈祖荣、金敏甫、邢云林等人。1922年朱家治《欧美各国目录学举要》、1926年杜定友《西洋图书馆目录史略》是介绍西洋图书馆目录技术的先声。1922年戴志骞《图书编目法》、沈祖荣《图书编目之管测》等文是开创性的讨论。金敏甫先后译著了《中西文编目连贯论》（1932年）、《图书编目原理》（1937）、《铁道部图书室之显明记录制》、《目录卡片之排列问题》、《目录设计法及印刷目录片之使用》、《印刷目录卡述略》、《编目方法》、《图书馆编目史略》等文。沈祖荣著译《中文编目中一个重要问题—标题》、《图书编目之管测》、《中国图书馆目录应采用书本式抑卡片式吗？》、《西文编目参考书》等文。邢云林《簿式目录中著录详略之研究》、《目录编辑法概论》、《书目与目录的编辑法》、《图书目录著录法与编辑法论》、《集中编目与合作编目法》等文。吕绍虞《图书之分类与编目》、《目录之编制》、《中文标题总录》、《分类目录》等文。杜定友《西洋图书馆目录史略》、《类例论》、《图书分类原理》、《图书分类法出版以后之讨论》、《中国史地图书分类商榷》、《明见式编目法》、《中国图书目录检字法》、《卅五年来中国科学书目编目细则》等。这一派中影响最深远的要算刘国钧先生。刘国钧先生著译有《中国现在图书分类法之问题》、《图书分类初步》、《怎样开始分类图书》、《四库分类法之研究》、《中文图书编目条例》等文章，其代表作是《图书目录略说》。

图书编目学一派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自辛亥革命后，公共图书馆广泛设立，又经过1925年的“新图书馆运动”图书馆管理客观上要求采用新的方法。这一时期一些留美学生纷纷回国，他们带回了欧美图书编目技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图书编目被认为是联系书和读者的“介绍人”，因而获得了重视。

图书编目学一派的学者很强调实用性，他们的理论主要是针对图书馆工作实际的，同图书馆学的研究十分接近。这一派又可分数家。

（1）研究编目方法的。主要著作有沈祖荣《简明图书馆编目法》、杜定友《图书目录学》、洪有丰《编目法》、沈祖荣《图书编目规则》、刘国钧《中文图书编目规则》、金敏甫《现代图书馆编目法》、何多源《图书编目法》、裘开明《中国图书编目法》等。论文如戴志骞《图书编目法》（载《暨南周刊》）、俞家齐《图书编目连贯论》（载《民众教育月刊》）、刘华锦《图书编目法概要》（载《学风》）、许振东《普通图书编目法》（载《浙江民众辅导半月刊》），以及张遵俭《中西目录学要论》。这些著作的作者，大多是留美学生，他们吸收欧美图书馆目录的方法，并加以发挥，对传统的图书馆工作是一个冲击。

这一时期关于编目法研究的特点是介绍英美理论居多，范围十分广泛。金敏甫《编目方法》介绍了“英美律例”和“克忒氏之字典式目录条例”。研究范围广泛，如编目条例的使用与修改。主题标目、编目手续、职务分配等等。

（2）专门研究分类法和主题法的。较早的如戴志骞《图书分类法》（1922）、《图书分类法几条原则的商榷》（1924）、刘国钧《中国现在图书分类法之问题》（1927）、《图书分类初步》（1928）、《怎样开始分类图书》（1931）、杜定友《图书分类原理》（1929）、查修《中文书籍分类法商榷》（1925）、吕绍虞《图书分类概述》（1934）、《图书分类之应用》（1934）、《图书的分类与编目》（1941）等。关于图书分类的译文如Richardson著《图书分类原理》（沈丹泥译）、Sayers著《图

书分类法的理论》(章新民译)、《图书类分条例》(金敏甫译)、John Ansteinssohn著《图书分类之两难》(何多源译)、白黎斯著《欧洲的三种图书分类法之批评》(林斯德译)、美利尔著《图书分类指南》(张鸿书译)等等。这一时期也有关于中外书目史研究的,如容肇祖《中国图书分类法的沿革》(1928年)、戴镛龄《西洋分类法沿革略说》、蒋元卿《中国图书分类法之史的检讨》(1934)、《中国图书分类之起源》(1934)、叶仲经《中国目录分类学史略》(1935—1936)、张知道《中国图书分类法史略》(1936)、白丁《七略四部之沿革》(1928)等。

图书编目学一派的学者从当时西学东渐、书籍内容杂糅的实际出发,将科学分类的理论引进到书目分类中来。他们介绍西洋分类法,冲破四部体系,创立号码制度,是有一定贡献的,可以说是完成了中国书目分类学史上的一次革命。但是分类法各家各自为政,新旧并存,是其主要特点,也是缺点。这一时期主要分类法有: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皮高品《中国十进分类法》、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宋孔显《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杜定友《杜氏图书分类法》、杜威《十进分类法》、陈天鸿《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程伯群《图书联合分类法》、裘开明《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法》、皮高品《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等。

关于标题法研究,最早的有傅汝民《华文杂志与西文标题》(1928)、沈祖荣《中文编目中一个重要问题—标题》(1929)、黄星辉《编目中的标题问题》(1929)、金敏甫《标题目录概述》(1929)、钱亚新《类名标题目录》等等。标题目录最早也是从欧美介绍进来的,讲标题必言欧美是其特色,金敏甫在《主题标题》中介绍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标题总录”和密恩所著“儿童目录之主题标题”。编目学一派的学者把分类、制标题、查著者、附注看作编目的一整套工作,研究的比较广泛,影响了其它流派的目录学家(如姚名达等)。他们的研究都是些开创性的工作不免有些粗糙。标题目录的成果如吕绍虞《中文标题总录》、沈祖荣《标题总录》、陈长源《中文标题法》、标题表如陈伯遼《百科参考资料标题类辑》、何多源《标题表》、吕绍虞《中文标题总录初稿》、吾愚《图书期刊索引标题表》、孙培西《汉译标题表》、金敏甫《铁道学主题标题表》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人主张将标题研究上升到“学”的理论高度,孙培西《标题目录学概论》就是一个例子,可见,标题目录越来越受人重视。

(3)专门研究著者号码表的。图书的个别化是图书分类的继续。最早研究著者号码的如《浙江图书馆报》的《中外著者统一排列法》、钱亚新《拼音著者号码编制法》、陈子《著者号码编制法》、宋春舫等《中国著者号码表》、王树伟《中文著者号码编制法的探讨》、胡政《俄文著者排列法》、彭道真《笔顺著者号码表》等等。

(4)研究索引法的。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单位先后出版或影印了许多古籍,如《十通》、《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十三经》等等,与此同时,古籍索引也相继出版了。

三十年代,最先正式倡议创设索引制的是林语堂。钱亚新《杂志和索引》、《期刊索引之检讨》、《索引和索引法》、《中国索引论著汇编初稿》,林语堂《图书索引之一新法》,洪业《引得说》等等是重要的理论成果。

(5)专门研究检字法的。由于图书编目学者大力倡导索引之编制,检字的问题得到人们重视,正如姚名达所言,“制索引者,喜创检字法”。同时,一些从事工具书编纂的学者也积极研究检字法,各种检字方法相继出现,如“六笔检字法”、“头脚检字法”、“边沿号码检字法”、“四角号码检字法”、“字音检字法”、“形位检字法”、“形体检字法”、“记端号码检字

法”等等。据当时资料统计,1923年已达到七十七种之多。

关于检字法的理论文章有钱亚新《从索引法去谈排字法和检字法》、《排检法的规则》、《排检法的原理》,杜定友《中国检字法评论》、《中国检字问题》、《关于检字法的话》、《民众检字心理略》、《汉字形位排检法大要》、《述汉字形位排检法》等,万国鼎《检字问题的讨论》、《各家新检字法评述》、《汉字排检问题》、《汉字母笔排列法》、《修正汉字母笔排列法大纲》等文,此外黎锦熙、张风、王云五、徐敦甫等都对检字法研究有较大贡献。这一时期,关于检字法的“论战”十分激烈。

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图书编目学各家研究的侧重点略有不同,但是作为近现代新目录学的一个重要流派,这些编目学家的思想存在共同点。这一派发端于二十年代中后期(即刘纪泽、汪辟疆等传统目录学走下坡路的时候),到抗战开始,它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了。

图书编目学派目录学家基本思想是:

1) 强调目录、书目、书志、著述史的区别。刘国钧认为目录原是以记载书籍为目的的。而郑樵、章学诚所提倡的目录学,是以书中表现的思想为对象,其重点在学术,而非书籍本身,为学术史的一部分。刘国钧认为Catalogue为书目,Bibliograph为书志,Literary history为著述史。就某所藏书而为之纪录者,无论其详细与否,皆书目也。冷录图书名目,或记载其历史或表述其内容,凡以记载书籍之本身与内容之情形为目的,不限于一地所藏者,无论其详略都称其为书志。而着眼于著者之学术、思想内容的,一律为著述史。杜定友、金敏甫都同意刘国钧的观点。1947年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重复了这个观点。

2) 反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传统,主张目录学为方便稽检的簿计之学,在于致用。刘国钧指出:“吾国从来之目录学者,皆在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他认为“这不是真正的目录学而是著述史的一部分”。刘国钧主张目录为便于稽检而设,他认为“解题”不足重要。但目录必能回答这些问题“求一书而不知其果在吾藏中否;在藏中矣,又不知藏于何所。知其何在矣,又不必知其之版本之果为何种”〔4〕。杜定友指出编目之学,乃簿记之学,其对象为图书,其目的在致用。批评古人论目录,必究学术源流与类例得失,“其最大缺点,在重主观而不顾阅者之便利与否。”舒纪维指出,“所谓辩章学术,考镜源流,若在一馆业务上讲则为类聚坟典、缥湘万卷,借众阅览,启发明知。”这派学者认为,我国古代的目录学在簿计群书的同时,还对书籍内容进行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作,这在书籍不多的情况下,对于揭示书籍内容了解学术发展的源流沿袭是大有裨益的。但自西学东渐以来传统目录学理论已不再适用于以纪录图书和检索图书为目的图书馆目录工作。

这派学者的意见同传统目录学家的见解是不同的。《隋书·经籍志》对于但录题及言,对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的甲乙簿式的目录深为不满。目录家还用有无提要 and 提要撰写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部目录的质量。郑樵主张明家法、讲类例。章学诚更是不同意“目录徒为甲乙部次纪”。

3) 主张编目之法为“学”。传统的目录、校勘、版本、文史目录学多言目录之学,启自西京之二刘。而编目学派不主张从这里寻找渊源,徐家麟指出“现代中文编目之学,在我国学术上已有所祖述、有所滥觞”,“所谓‘推名家数,惟图书宗旨’,所谓‘春秋正义’,引魏晋仪注,写表有出格,出格即今之抬头也”,“所谓‘长于已部,兼综掌故之人材,可令作志书’皆可为现今编目之理论与实际作注脚。”

杜定友曰:“编目学乃簿计之学,其对象为图书,其目的在致用”,“图书编目,为专门之

学,有赖乎专门从事之人”。邢云林批评旧的目录学“忽略方法之检讨”,“新的目录学……脱离编目之重心”,主张新旧结合,“编目学者文学亦科学也”。1926年,金敏甫因观图书编目之学尚鲜专书,欧西编目之法又未能尽合我国图书馆用,著有《图书编目学》一书,杜定友为之叙,全书讲了理论、经营、条例等事,可看作一个体系。他认为书目学一叙述书籍之内容及其历史,并论及其书著者、主题、印刷材料版本等事。此种科学,名曰书目学。对于书目学与目录学之联系,他说,“我国昔日,无图书馆学之名词,而其时所谓之目录学,实际上即含图书馆学之性质,特其范围较狭耳。”〔5〕

4)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创新的一派,他们的许多观点不无偏激之处。杜定友在《校雠新义》中说“中国古有目录之学”今天没有目录学,今天的乃是簿计之学。他还说,“不可期目录期书目。期书目者,期类例。期类例者期著述史。期著述史者,期目录。”强调他们之间的区别,忽略了他们之间的联系。

二、日本书志学理论与中国目录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书志学一派

这派以留学日本的马道源为集大成者。“书志学”在中国较早见于1922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载有日本橘井清五郎《西洋书志学要略》一文。1934年该会报载有马道源《书志学》,后有《图书馆学季刊》连载日本小见山寿海《书志学》一文。书志学一派学者认为,书志学有综观、纵观、分观三种。综观的书志学,记载图书的整个,分观的书志学,则以讨论个个图书为天职。“目录学则为分观的书志学”。王古鲁又译版部字之吉著《目录学概论》,作为“分观的书志学”,该文探讨了目录的发端、流变与功用等等。1934年马道源出版《书志学》,他认为书志学不同于目录学。书志,即“书的历史”。书志学的对象是图书。

书志学一派,影响不大,但作为一派对目录学的理解,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三、“新旧俱全”的折衷派

这派介于传统目录学和新目录学两个系统之间。他们既赞成传统目录学“兼学术之史”的思想,又强调目录学的“便于稽检”的作用,折衷于传统派和图书编目学一派。他们主张使用卡片目录、主题方法,用“解题”揭示图书内容,主张中外统一分类,集中编目,寻找目录学的发展道路。可以说,开辟了现代目录学的新方向。这一派以姚名达为代表。1941年,黎锦熙将它发展为“四化一元”的书目控制思想。“四化一元”即目录学之世界化、现代化、科学化、工业化和用类码法控制宇宙的一切知识。〔6〕代表作有姚名达《目录学》、《目录学史》,容肇祖《中国目录学大纲》、毛坤《目录学通论》、程伯群《比较图书馆学、书志目录学》、王公五《新目录学一角》、黎锦熙《新目录学及“类码法”之扩大应用》、《新目录学论丛》。这派的形成和发展,大约始于图书编目学走下坡路时期。

姚名达的老师梁启超是一个对目录学有重大贡献的政治家。梁启超早年撰《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东籍日旦》具有进步意义。并最先冲破四部书目分类体例。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后,梁康成为君主立宪派,其“新学”宣告退却。1923年他撰写《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最低限度之国学书目》(并附“治国学杂话”),1923年撰《戴东原著述考》、1925年撰《要籍解题及其读法》、1925年撰《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1926年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汉志诸子略以外现存诸子书》、《中国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目

录》部分。

姚名达, 1928年入清华研究院, 师于梁启超、王国维。在校期间, 颇受梁的器重。梁启超关于目录学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姚名达, 使他成为一个“新旧俱全”的目录学家。关于目录学史, 姚名达研究了《别录》、《七略》、《汉志》的关系。以《隋志》的书目分类体系为标志将古代目录学划分为正统派、别派、修正派三类。系统地研究了我国目录学史上杰出的目录学家如刘向、刘歆、班固、王俭、阮孝绪、晁公武、陈振孙、郑樵、章学诚、补承绪、纪昀等的目录学著作、思想、贡献。关于现代目录学之法, 他研究了分类法、编目法、标题法、检字法, 倡导卡片目录应用, 标题目录的试验等等。对于西方目录学理论, 他研究了西学输入后, 学术的变化, 主张对外国分类法的修订, 对西书卡片精写提要等等。关于目录学的派别, 他以“类例”为标准, 划分为“班志”派和“隋志”派, 混淆了书目类型和目录学流派。〔7〕

对传统目录学的批评与创新。毛坤指出“中国讲求目录之学, 虽已有数十年之历史, 然而大都于分类范围之中, 回旋往复。”姚名达认为, 我国过去的目录已有三千年历史, 而“仍旧在一个圈子里打走圈, 没有直线进步。”他不同意目录学“重在周知一代学术,”认为应当“辨析条流, 以为纲纪”。〔8〕王云五认为“旧的目录学有革新之必要。”“图书分类为新目录学之纲领, 检字法为新目录学之重要工具。”〔9〕严文郁论述了目录学“事”与“人”的关系。黎锦熙抓住了“读书指导”与“图书管理”渐发生对立之矛盾这一根本, 提出了“四化一元”的新理论, 到1948年黎锦熙出版《新目录学论丛》一书后, 这种“新旧俱全”的理论也被新中国目录学代替了。

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各种目录学流派的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在现代目录学史上, 传统目录学的特点是厚古薄今, 而新目录学则厚今薄古。传统目录学是“治学之学”, 而新目录学则是“治书之学”。现代目录学就是在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现代目录学的发展史, 就是他们之间矛盾运动的历史。现代目录学中的矛盾运动, 也为我们今天建立新时代——信息时代的目录学提供了许多启示。

• 注释 •

〔1〕彭斐章, 谢灼华. 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 1980, (1)

〔2〕林嘉. 论图书馆职能演变的规律. 图书馆, 1989, (3)

〔3〕谢灼华. 辛亥革命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 1982, (1)

〔4〕刘国钧. 图书目录略说. 图书馆学季刊, 1927, 2(2)

〔5〕金敏甫. 图书编目学. 1926

〔6〕原文为: 所谓“新目录学者”者, 其新又安在? 第一, 将利用此种部类, 整理控制宇宙间之一切, 不以图书为限。第二, 将使此种部类与其运用之方法, 确有整理控制宇宙一切之可能。

(一) 世界化。世界各国, 凡有历史文献可言者, 其思想学术莫不各具独立之系统, 在中国近称为“国学”, 然近为“新目录学”, 绝对必统一之。(二) 现代化。世界之一般障碍, 即为各具独特之系统之“国学”, 而任何国学皆属历史文献及民族文化之性质, 在学术大系统上, 容易处理, 但作客观的分析, 使各得其所足矣。一切部类, 标准现代, 不拘泥于过去之习惯, 亦不必懂

(下转第50页)

目,不可读天下书”的境界,是不现实的。

在书目历史研究方面,思维方法片面,往往注重书目本身的研究,没有和文化社会背景建立广泛联系,更多的只是指出书目的成就特点,没有剖析它的不足和问题,而且研究中不断重复原有的结论,把历史与现实隔得很远,历史是历史,完美无缺,现实还是现实,和古人无法相比,无形中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组织管理的散乱

如果不是故作大度,我们会感到,四十年来的书目资料是“数量的热潮,低级的繁荣”。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宏观无控制,微观无计划。

许多人在文章中呼吁,国家应对书目资料选题加强管理,并且提出可行的措施,但时至今日没有付诸执行。在选题方面,不是根据需要,而是哪家有什么人才就编什么专业的书目资料,谁有积极性谁就编,完全是单干式的,自由式的。有时英雄所见略同,都对某一书目选题感兴趣。大家就都开展攻势。编的结果不是两败俱伤,而是多败俱伤。即便在攻势中取胜的能出版的书目,也是先天不足。给败者留下“补遗”、“商榷”的“余地”。这种散兵作战的方

式,眼下还在继续。与此相反,在许多学术领域还是一片荒芜的处女地,无人问津。说来惭愧,人人讲科学管理,上上下下讲书目报道体系,就是对书目资料领域里这个最现实的问题不采取措施。

对于书目资料质量的管理也相当混乱,几十年来编制的书目资料数以万计,自然有高下之别。但是,除了对少数几种书目资料作了评论介绍外,绝大多数印行后没有任何评说,好的书目资料发挥不了作用,差的书目资料得不到批评反馈,于编者于读者都不利。质量的管理重在书目人员的学术水平。古代有个传统,专家学者编书目,书目人员要“久任”,并把编书目当成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今天的情况大不一样,尽管也曾经组织过专家编制一些书目,不少学者在报刊上偶尔也发表几种“必读”、“举要”之类的书目,但毕竟没有把编书目看在眼里,更没有把编专业书目当成一种得之于社会的还之于社会应尽的文化义务。取而代之的是图书情报部门缺乏业务培训且时常调动的新手,编制的书目资料不成体系,不乏应时急就之作,除了自我欣赏外,很难得到社会的利用和承认。不解决组织管理问题,书目资料报道体系及其质量很难得到解决。

(上接第56页)

憬,将来之理想。有些客观的时代标准,则纠纷皆释。(三)科学化。所谓现代,其精神全在科学,此非但指各种科学之理。而科学化又可滤清现代化之种种渣滓。因现代化仅为一客观的时代标准。……今以科学为权衡,严格分析,正确分配……此时代精神所在也。(四)工业化。此似戏论,抑“台喻”也。且此非指工业本身而言乃谓工业化之基本观念也。工业化之基本观念即“效率”。新目录学求效率增高与扩大,其手段决不能以分类之合理化为满足,而必须用数码表示之,故不曰“部类”,而名“类码”。以上四点为新目录学组织之原则,谓之“四化”,“四化”之外,又当益以“一元”。何谓“一元”?一切皆支配以具体的学术类码,俾人人皆从宇宙之大系统中,自识其人生六位与生活途径。是谓“一元”。(原文载《东方杂志》1945年41卷17期)

黎锦熙先生的这段对“新目录学”表述的精要之语,现已难普及,故录出以供同仁参考阐发。这段表述无疑就是“世界书目控制”思想。这比美国的伊根与谢拉1949年提出“书目控制(Bibliographic Control)”要早4年,值得重视。

〔7〕〔8〕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

〔9〕王云五.新目录学一角,1943